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探究

曹天航

内容提要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加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中国梦能否实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巩固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需要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经济基础,而且需要创造性建构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创新性地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权 建设路径 核心价值观

曹天航,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8

当今世界,话语权已然成为各国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重要传播手段。从国际交流的角度看,话语权不仅仅是简单的话语交流,而且是国家间以国家利益为目的,发表观点、立场的权利,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争夺也演变为比拼各国文化软实力的方式。作为文化的表述形式,话语的真正内核就是意识形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不仅关系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意识形态的辩护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的心理基础和机制在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这需要两个基本要求:意识形态自身具有引领多元价值观念的内在品质以获得合法性;意识形态所认同的主体实践精神基础,以避免纯粹政治工具化倾向或纯粹利益考虑的工具化认同。因此,基于这两个要求积极探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有效路径,切实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经济基础

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体系中是耸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功能表现为能动地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基础。如果意识形态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存在就拥有了合法性;反之,即会丧失合法性,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一旦松动,是无法继续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尽管,“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魅力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及实证研究”(10BKS06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1]因此,思想必须为群众所掌握与运用,而其前提则是通过强化经济基础以建构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避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中忽略利益存在论的纯粹政治工具主义倾向。

1. 加强经济基础是根本任务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及其相互作用。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安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安全,意识形态与其代表的阶级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占有有着本质的联系。要从根本上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程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发展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

马克思确定地把意识形态乃至广义的文化概念赖以生成的源泉归结为经济基础,把物质生活及其生产过程理解为思想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并归结为现实的人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对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分析呈现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不仅揭开了笼罩在历史现实之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神秘而虚幻的面纱,而且强调了意识形态或精神自觉的文化解放意义与实践功能。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引领着经济建设的方向,为经济建设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使人们从内心认可经济活动中各种财产关系的合理性、交换关系的公平性以及分配关系的正当性,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种规则的认同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因此,“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明确提出了正确对待这两项工作的实践要求,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指明了方向。

2. 实现共同富裕是核心目标

马克思从财产关系与支配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表达了对于一个社会正义性的理解,可见马克思在经济化的路径上理解与把握政治问题并把这一问题的核心规定为财产权,进而把财产权理解为穷人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规定自由的最高意义,超越了以所谓“天赋的权利”或“普遍人权”为精神价值的近代政治自由思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的本质是被剥夺,是财产权的压迫性所导致。因而是现代自由的真正难题。马克思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分析财产问题,进而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看作是财产的政治本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的分离规定为以“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离,进而在政治上将其揭示为财产权与劳动能力的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对劳动能力来说是“他人的财产”,而财富的创造过程对财产权来说是“他人的劳动”。这样,资本主义所有制劳动与资本的分离造成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财产权合法性与其一般权利原则所要求的公民自由的兼容性、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不能兼容,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3]。

针对资本主义早期的两极分化,马克思曾明确提出未来社会将以所有人的富裕和全面发展为目的,而这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否定从而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支配关系,以一种“真正人的社会的财产”概念来取代现有的资产阶级财产权概念。在我国,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走向了绝对平均主义,结果是“共同贫穷”。邓小平对共同富裕做了系统阐述: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第二,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先富带后富。贫富差距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都是深刻的,促进共同富裕,是我国传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当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2]《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3]张盾:《“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共同富裕,要充分借鉴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要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目标,根据现实要求和阶段特点进行科学认识和把握,在总体上确立和坚持共同富裕价值理想和追求的前提下,同时体现主体认识的差距和不同层次的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3. 坚持五位一体是总体布局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以及观念结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宏观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内在功能。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因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体系”与“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社会变革的有机结构整体,并通过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而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维护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在“社会结构性”功能与能动的“自建构性”^[2]。

因而,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应该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结构性关联,坚持全面而系统的协同发展,在这种协同机制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八大对全面协调推进“五位一体”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十六大的三位一体到十七大的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的五位一体,我们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和重大部署,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根据实践与时俱进的结果,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更加完善、更加科学,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拓展。总体布局思想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五大建设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具体战略目标,这是党对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五位一体总布局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建成的小康社会,既是经济目标,又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的目标;既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生态良好的目标,又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目标。这一新的更高的要求,使全面建设的内容更完备、特点更鲜明、描述更具体、蓝图更清晰。五大建设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发挥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应协调推进,不能顾此失彼,在解决政治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就需要与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有助于政治建设的开展,而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社会建设实则就是在为政治建设打基础;在解决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也可能需要运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等的方法,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当创建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生产方式当中,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各个方面。

二、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保障机制

作为上层建筑重要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体系存在自身的规律及其特定的发挥作用的方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陈秉公:《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途径》,〔北京〕《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

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中应当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第一领导权理念,加强意识形态的主体建设,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实践意义。

1. 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第一领导权理念

话语权与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第一领导权理念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从一种否定性内涵向肯定性内涵的转变密切相关。在由列宁所开启的这一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探索最完备也最富见地。他认为,领导权概念不能仅仅定位在经济领域并由此发展出领导权的三种组成方式:“绝对的支配状态”、涉及意识形态建构的“政治合法性的建构问题”以及“文化(道德)合法性建构问题”,而只有渗透到文化层面,才能通过文化合法性建构认同的心理维度,使人们自觉遵循着统治者的领导权逻辑。这不仅体现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既非经济决定论也非精神统一论,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联系”,而且使得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其领导权理论的核心概念^[1],与其扩展了意识形态的肯定性内涵“有机的意识形态”概念密切相关: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有能力“组织”人民群众,并把自身转化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指南。

因而,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其领导权的建构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事关”的论断深刻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其总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服务,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无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理论上,国家的权力结构可以进行多种划分,但在较高或较抽象的层次上,现代国家权力可分为政治统治权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后者意味着国家权力在观念领域开始走向社会化,市民社会及其精神生产成为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3]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和实践性,以明确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向现实,具有进入和指导实践的强烈意向。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4]邓小平也曾强调:“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5]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历史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必须牢牢巩固和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这是第一领导权。

2. 切实加强意识形态主体建设

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在社会多元价值观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乃至社会整合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品格,即“一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二是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两者内在联系在一起”。否则,“即便它有国家机器的倡导,也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必然要被边缘化,即在多元价值观中不能起主导和引领作用”从而被边缘化^[6],其内在根源则表现为主体性的缺失。因而,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一方面,必须注重意识形态的主体建设,以获得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实践精神基础,避免对于意识形态基于纯粹利益考虑的经济工具主义认同;另一方面,需要注重意识形态队伍建设。

形塑意识形态的主体,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重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队

[1]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3]程竹汝、郭燕来:《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北京]《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6]陈新汉:《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人民主体性》,[北京]《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伍建设。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承担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责任,对提高教育客体的思想觉悟、树立理想信念、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过:“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队伍,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从思想、政治和工作上关心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确保为做好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要加强教育管理,引导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强化理论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引导意识形态工作者理直气壮讲正气、深入基层接地气、服务群众聚人气、有守有为显志气,准确、鲜明、生动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引导意识形态工作者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鼓励他们为党、为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同时加大对意识形态工作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力度,加大对重大理论研究和实践课题的投入,充分尊重广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研究者的劳动,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可靠支撑。此外,还应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范围,建立科学的激励考核机制,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加强考核评价队伍建设,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任用直接挂钩,能者上、庸者让,对那些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问责。要切实贯彻“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管理体制、管理内容、管理手段创新,做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提高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

3. 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

发展社会主义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战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强大的保障。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天然联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必将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这里的启示在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基于观念形态与精神生产文化实践的区别与联系,探索与发展意识形态的功能得以发挥相适应的物质技术条件。马克思就曾明确区分文化或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以此强调精神生产的“文化实践”意义,认为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而正是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人们往往重视经济实践与政治实践而忽视文化实践。不过,“文化要发挥其影响现实生活的实际力量,必须通过文化实践由一定的物质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否则“文化观念就难以对社会生活发生实际性的影响”^[2]。同时,同样需要警惕资本等经济因素对于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与入侵。哈贝马斯即是继承与发展这一思想,以“社会整合”理论揭示资本对生活世界乃至文化领域的“殖民”而最终导致价值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困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思路的确立,加快了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使文化建设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当代中国,既要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既要尊重精神产品生产规律,又要按市场规律运作办事;既要抓住社会效益,又要追求适当的经济效益,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必须大力推动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增加数量和种类,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宣传文化事业的竞争力;鼓励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借鉴国际文化产品生产的新形态,积极推进文化内容创新,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最广泛地赢得群众,从根本上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2]郝立新、路向峰:《文化实践初探》,〔北京〕《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

的认同度,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三、创新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坚持知行合一、行胜于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培育以“知”为认识出发点,是道德意识的内化;践行以“行”为效果落脚点,是道德行为的外显。“知”是“行”的思想指引,“行”是“知”的实践转化,“知”和“行”必须协同推进,影响和效果才能体现出来。而当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的文化事件中,存在着的最大问题甚至不在于价值观念的认知,而在于未能外化为现实价值行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必须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导向、个体自觉的行为规范,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首先,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其他社会成员都有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键。党员干部要坚持理论学习,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强化宗旨意识,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自觉遵守党章,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其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自古以来,立德树人就是教育的天职。必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将其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落实到基础教学和管理服务等具体环节,构建大中小学各有侧重和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思想、产生共鸣、凝聚价值、达成共识;构造校园文化、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再次,加强和改进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知识分子是建党与建国、强党与强国的关键促进因素、核心战略资源,我们党素有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光荣传统,要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落实“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引导他们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巩固和壮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基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沟通和联系,努力增强党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2.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具象化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而言,达到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的现实统一,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与具象化。生活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并外化为现实行为的内在要求,其基本涵义在于基于社会主体对于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的认同,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转换为大众化的日常生活实践。马克思曾经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生活,再好的价值观也只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领悟。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融入到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不断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要注重宣传教育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把教育与疏导结合起来、正面引导与合理批判结合起来,把推进意识形态建设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协调配合起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

的不断完善激励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认同;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创作之中,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心声、反映基层状况,使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善于用家常话、用平实的语言开展理论宣讲,让群众听得进、听得懂、听了信;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到基层去,把群众喜爱的语言、样式作为表现形式,把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作为素材,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让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努力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文化生态。

3. 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

理念创新的重要方面是营造舆论强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要充分认识媒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新闻媒体必须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新闻价值,讲求实际效果,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提高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提高舆论监督的公信力;不仅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成为主力军,而且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也要发挥自身优势,适应分众化特点,实现舆论全覆盖、媒体全联动;不仅新闻报道、专题节目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所有娱乐类、体育类节目以及各类广告也都要符合和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拨动人们的心弦,引起人们的共鸣,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手段创新的重要方面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抓好网上宣传思想工作正成为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面对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必须切实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加大投入,认真学习,尽快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抢占这片新的舆论阵地。要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方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上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充分发挥其引领和建设性作用,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重大信息要在网上及时、准确发布,积极回应网民关切,主动有效进行网上引导;积极鼓励创作格调健康和适于新兴媒体传播的网络文化作品,推动当代文化精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传播;推进网络法制建设,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打击网络谣言和违法犯罪,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基层创新的重要方面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建立国家、社会和个人联动机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使各方面的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防止具体政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要注重在社会管理、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使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受到制约;各级各类管理部门要把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份内工作,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深入人心,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责任编辑:钱继秋]